

國學初階

義理學性

唐文治◎著

符思毅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國學初階

性理學大義

唐文治◎著

符思毅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性理學大義 / 唐文治著. — 上海 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6.1
(國學初階)
ISBN 978-7-5675-4667-7

I. ①性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理學—研究 IV.
①B224.08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6)第027644號

國學初階

性理學大義

著 者 唐文治
點 校 者 符思毅
特 約 編 輯 黃曜輝
項 目 編 輯 龐 堅
封 面 題 簽 吳東昆
裝 帧 設 計 崔 楚

出 版 發 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 服 電 話 021-62865537
門 市 (郵 購) 電 話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蘇州工業園區美柯樂製版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87×1092 32開
印 張 13.5
字 數 225千字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
書 號 ISBN 978-7-5675-4667-7/B • 998
定 價 39.8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 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整理弁言

唐文治先生，字穎侯，號蔚芝，別號茹經，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（公曆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三日）出生於太倉鎮洋縣境岳王市陸宅之靜觀堂。公曆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，病逝於上海，年九十歲。其弟子親友張菊生、冒鶴亭、金巨山、朱貫微等百餘人謚曰“文成”。

其一生歷四朝，作過清朝商部尚書，位列一品大員，編訂《商律》，規範和發展商業；又興辦學校，主持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十四年，主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三十餘年，興辦實業，讀經救國，以造就領袖人才、聖賢豪傑為己任。門人弟子滿天下，盛極一時。其著作豐富，涉獵廣泛，於經學、理學及文學等方面均有高深造詣。

其出生於商宦之家，書香門第。曾祖唐森階欽賞八品頂戴，候選按察使司知事。祖唐學韓誥贈榮祿大夫。其記述說：“遺書雖不多，然皆先人心血之所寄也。”（《家祠藏書謹志》）又說：“堯蓂公居滬上，設稅行，逐什一之利，頗饒於貲。”（《王考府君事略》）父唐受祺，號若欽公。恩貢生，一生作塾師，講學四方。歷經十餘年，輯成《陸桴亭先生遺書》二十八冊，又編有《鄉先賢遺著》一冊、《明辨錄》一冊、《周易故訓訂》二冊、《梅村詩摘鈔》一冊等書。母胡氏，通經史大義。姐唐文珠，幼聰慧，通文理，喜讀唐詩，早卒。

其為學之次第，大抵由理學而經學，兼及文學、史

學。六歲始學識字讀書，且母親督教極嚴。家境貧寒，益刻苦，常隨月光讀書。八歲讀《孟子》，有爲伊尹之志。十四歲時，讀完《五經》，又好詞章訓詁之學。十六歲考入太倉州學，讀《公羊傳》、《谷梁傳》及《史記》，始學作古文。十七歲拜王紫翔先生爲師，學習性理之學。讀書漸精進，並以“行路不斜視，務收束身心”自勵。此年，中舉人。二十歲讀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爾雅》，始從事經學。二十一歲就讀於江陰南菁書院，遂拜經學大家黃元同先生爲師，研習經學。二十八歲，中進士。其一生淹貫經籍，治學嚴謹，又講求微言大義，於經學、理學、文學尤有建樹。

其師友弟子之淵源，進退出處之際遇，均有可觀之處。於性理之學，則拜王紫翔先生爲師，讀書作文，從立品立志始，而主之以躬親實踐。後其師翁同龢評價說“唐某學問、性情、品行，無一不佳”。於經學，則拜黃元同先生爲師，又協助王先謙先生校刊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，於經學之經文釋義、經世大義多有創見。又拜大儒沈子培先生爲師，亦多有所獲。良師益友，道義相勉，知心爲貴，互爲扶持，終始如一。王紫翔先生去世，唐文治深切悼念，“追念教誨之恩，涕泗滂沱。六月初旬，複往奠一次。與諸同學商，諡曰‘文貞’”（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）。又說：“夫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先生也。”（《茹經堂文集·王紫翔先生文評手跡跋》）及中進士，翁同龢先生評語說：“經生之文，必有

靜穆之氣，此作是也。經藝淵雅，不使才鋒，策駁博。”（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）後又多次引見。中日戰事起，唐文治上《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摺》，自記：“此稿翁叔平、沈子培兩師深加歎賞，稱為萬言疏稿，惜兩行痛淚，無補時艱也。”及翁同龢奉旨開缺回籍，唐文治送至正陽門車站，有“黯然”離別之情。至翁同龢去世，唐文治挽聯：“公之平生，司馬君實；我有知己，歐陽文忠。”又說：“文治知己，先師王文貞、陸文慎而外，獨有公耳。”（《茹經堂文集·記翁文恭公事》）於此，可見其師生情意之至深至切。

其一生收徒甚多，早年門人有于玉峰、雷君曜、李頌韓等人，後又收劉翰臣、翁綬珩、朱貫微、孫宇晴、張公權、胡振廷、金叔初、唐景升、何葆恩、胡粹士、張貢九、魏建猷、王蘧常等等，其中王蘧常、陳柱、錢尊孫等人最為其所讚賞。然而，許多弟子都先其去世，李頌韓去世，唐文治感慨說：“頌韓從余遊，垂四十年，感情最厚。”（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）又說：“邇者蘧廬風雨，講學無徒，同氣相求，邈不可得，幸有如頌韓其人者，方把臂入林，乃悲秋而倏泯。後先禦侮，誰與干城？”（《茹經堂文集·李頌韓養廬文稿序》）並以韓愈、李元賓作襯，師弟之情，實有過之也。胡粹士去世，唐文治悲痛不已，“余與君師弟之情，歷三十餘年，而君復或念餘恩，至死不渝，餘將何以報之耶？”（《太倉胡君粹士墓誌銘》）師生之宜，前後彷彿，令人感慨流涕。

其宦仕之順，功業之顯，亦可謂至矣。自二十八歲簽分戶部江西司，至四十二歲任署理農工商部尚書，十四年間，升遷之快，鮮有及此。於內則積極興辦商業，於外則考察外國之情狀以輔國事。離政之後，主持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十四年，主持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三十餘年，或興辦實業，或讀經救國。其立志之高遠，謀國之忠懇，成效之顯著，多為後人所不及也。

其著作豐厚，所發之說，遂為定論。二十三歲開始編《茹經堂文集》，後共成六編。由人品之高雅，沛然見之文章者，於經學、理學、文學無不佳矣。如《周易消息大義》、《尚書大義》、《禮記大義》、《詩經大義》、《孟子大義》者，無不依文解義，而又終始寓以經世之大法；如《性理學大義》、《性理救世書》、《性理學發微》者，發明性理之精微，而又以正人心、立品行為當世急務；如《古人論文大義》、《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》者，皆直揭文章陰陽剛柔之旨趣，而發千古聖賢明理養氣為文之精義。如此之說，貫其一生，風骨氣節，又巍巍然矣。又有《茹經堂奏疏》、《政治學大義》、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等著作傳於世。

唐文治之所以為《性理學大義》者，以其實有理學之淵源也。正如前說，其十七歲拜王紫翔先生為師，學習性理之學。於王紫翔所說“文章一道，人品學問皆在其中。故凡文之博大昌明者，必其人之光明磊落

者也；文之精深堅卓者，必其人之忠厚篤實者也。至尖新險巧，則人必刻薄；圓熟軟美，則人必鄙陋。汝學作文，先從立品始，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，亦不患不爲天下第一等文”，尤爲服膺。於是“余日夜淬屬於性理文學”，學頗精進，又以“毋不敬，毋自欺”自警，希望希賢，乃有心得，理學益日進。因人品與理學之大進，欣然有得，後又著《紫陽學術發微》、《陽明學術發微》、《宋明諸儒說主一辨》、《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》等書和文章，而亦有此作也。

然其輯《性理學大義》之真實用意，蓋另有原因。一九二〇年十月，唐文治以“自上年學潮後，學風愈覺不靖”及“父老病，目疾日深”爲由，不顧交通部以及學校同人再三挽留，辭去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之職。而時僅隔兩月，又欣然應施省之邀請，合力開辦無錫國學專修館，並任館長之職。其出處之際，或有深意。蓋因當時之世，西學浸進，學風日下，國勢日危，“正人心，救民命”不可須臾緩也；又居家講學，平生之志，“維持人道”、“挽救世風”、“務望諸生勉爲聖賢豪傑”正其時也，一九二二年冬於是乎有是作矣。直至七十歲，其還在爲學生講授此書。可見唐文治於門人弟子之殷切期望也。

然則此書之成效如何，不敢遽言。但唐文治於理學之重視，蓋可知矣。其在《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》中說道：“吾館爲振起國學，修道立教而設”，特別看重

“檢束身心，砥礪品行”，而《性理學大義》之作，亦正應乎其時也。其以理學立身，人品甚高，如孔子所說“德不孤，必有鄰”，由其自身人格之影響而成就之學生，如李頌韓、王蘧常、陳柱、唐蘭、吳其昌、蔣天樞、馮振、錢仲聯、周振甫、馮其庸、湯志鈞、王紹曾等等，皆可為後世學人之楷模也。

性理學，即性理之學也。《御制性理精義·序》說：“唐虞三代以來，聖賢相傳授受，言性而已，宋儒始有性理之名。”“性”、“理”即為二字，其義實有不同之處也。

性者，蓋天所賦而在我者之謂也。其義當有二：一則性即理也，二則性即生即氣也。《易·繫辭傳》說：“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《中庸》說：“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”陳淳《北溪字義·性》說：“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，故謂之性。性字從生從心，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，方名之曰性。”此處概只就天地生人而言性即理也。然而天地生物，非止於循其理而已，實有以生之質也，故性者生也氣也。明道先生說：“‘生之謂性’，性即氣，氣即性，生之謂也。”（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一）而陳淳又兼理氣言性，則性之義備矣，其說：“大抵性只是理，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個理，須有個形骸方載得此理。其實理不外乎氣，得天地之氣成這形，得天地之理成這

性。”(《北溪字義·性》)

理者，蓋天地萬物之所以然者也。其義亦有二：一則理即事物自然之理，二則理即宇宙萬物之終極原因。宇宙間一物即有一物自在之理，自然而然也。明道先生說：“天地萬物之理，無獨必有對，皆自然而然，非有安排也。”又說：“萬物莫不有對，一陰一陽，一善一惡，陽長則陰消，善增則惡減，斯理也推之其遠乎！”(皆見《河南程氏遺書》卷十一)伊川先生亦說：“凡眼前無非是物，物皆有理，如火之所以熱，水之所以寒，至於君臣父子間，皆是理。”二程子所說是也。然究察萬物之極致，則理即爲宇宙之終極原因也。朱子說：“未有天地之先，畢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便有此天地，若無此理，便亦無天地，無人無物，都無該載了。有理便有氣，流行發育萬物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一)陳淳亦說：“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。”(《北溪字義·性》)

性理二字雖義有所不同，却也實有相合之處，即有“性即理也，所謂理性是也”之說，故性理學亦可稱爲理學。周子《通書·理性命第二十二》即表理、性、命三者之一貫，可知論性論理，若有所偏頗，則於道學不備矣。

性理學興起於宋代，時人稱之爲道學也。宋、明之史，皆有《道學傳》，自周敦頤起，錄其師弟之傳授，及學派之脈絡。而後世性理之書亦多之矣，如《性理

大全》、《理學宗傳》、《御制性理精義》者，爲性理學書之集大成者也。

唐文治《性理學大義》於民國十一年冬編成，十五年後，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，由無錫光復路民生印書館印刷，發行者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及無錫城內西溪唐宅。

此書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十三。共上下兩冊，分五大義，爲總目，系於書前；而每一大義又各自獨立，且各自目錄系於本大義之前。正如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所說：“定《周子》二卷，《程子》二卷，《張子》一卷，《洛學傳授》一卷，《朱子》八卷。每卷各冠以敘文及傳狀，發明大義，篇中精要處，各加評語、圈點。學者得此講本，可窺性理學之門徑矣。”蓋爲初學者作也。

是書所輯述，止於宋代諸性理學大家。《周子大義》二卷、《二程子大義》二卷、《張子大義》一卷、《洛學傳授大義》一卷、《朱子大義》八卷，就分卷之情狀、篇幅之多少而言，《朱子大義》最多，而《張子大義》與《洛學傳授大義》最少。朱子爲性理學之集大成者，故輯錄最多，以見其大成；周子發理學之端，所傳之書不多，故全錄《太極圖》、《太極圖說》與《通書》，以見其淵源；二程子曾受學於濂溪，得吟風弄月之趣，及發傾心求道之心，承師而光大，故僅見其端；張子參聖學之

源，實不出周、程之意，故略加選錄，以存其概；洛學之傳授，蓋以其承先啟後，所及楊、呂、羅、李諸先生，以見其緒耳。

性理之學，博奧精深，雖皓首窮經之士，亦或不能登其堂奧。而况初學者乎？唐文治病前儒所輯不得其要，又或論道繁冗，未足以爲講本，故乃詳加選錄，擇其尤精者著於篇。是則其編選之旨趣可見矣，首推周子，而體察周、程之一脈；僅擇兩宋理學諸子，而示程、朱之淵源。由朱子之大成而上溯其源流，則是其主旨也。朱子乃親受業於李延平之門，延平則得楊龜山之傳，龜山僅占二程四大弟子之一，張子與二程則介乎親師友之間，二程又親炙周子，前後承傳，欣然可見。錢穆先生說：“周張二程四人之爲學，亦各有其一己，亦互有其相異。而朱子會通和合之，以成宋元明三代理學一大傳統。”（《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》）唐文治亦感慨說：“朱子之書，猶夫子之官牆也。”（《朱子大義自敍》）以此可見其推崇朱子之意。

至於此書之內容，則唐文治於每大義前“各冠以敘文及傳狀”以發明之。《太極圖說》、《通書》，濂溪所著，實則又多本《易》而發。《周子大義》全錄之，以見周子“開宋、元以來理學之先河”之功。並附及“諸儒太極論辨”，而發明周子太極之本義。使初學者得略窺性理學之發端也。唐文治認爲周子之學實源於孔、顏，《太極圖說》，即性善之旨也。又謂周子主靜之說，

其要在於一“幾”字，並貫通程朱一脈之終始，“此言也，蓋直紹曾子、子思子慎獨之傳，而《中庸》所謂未發之中，其義於是乎顯。此程、楊、羅、李先生恪守師承，其學所以皆主於靜；而龜山先生以下相傳，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，實基於此；至朱子而已發、未發之說，於是大明矣”（《周子大義自敍》）。其說當是也。

二程子之語錄、文章雖多有精義，然則不著書。是故《二程子大義》所輯明道先生之文章，僅如《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》、《識仁篇》、《論性說》等五篇；伊川深明於易理之精微，畢生最大著作為《易注》，故所輯入九篇中有《易傳序》、《易上下篇義》、《易序》三篇，又有《顏子所好何學論》、《養魚記》等篇，此皆所以明乎“仁”、“性”、“氣”之說，多得力於周子也。故唐文治說：“蓋二程先生之學原於《太極圖說》，讀《定性書》及《顏子所好何學論》，授受一脈，已可概見。”（《二程子大義自敍》）

宋代理學家，惟周子、張子有著書。張子又深明治道，而此《張子大義》僅一卷，錄及《西銘》、《東銘》兩篇文章，附《諸儒西銘論說》為一篇。蓋張子於程朱一脈，僅得與二程則介乎親師友之間，而又此兩篇頗得二程子切磋之宜，程子謂《西銘》明理一而分殊，又說《西銘》非子厚筆力不能作。“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”，即儒家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“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”推之於極致之謂也；又此兩篇

文章，一則闡述孔子《易傳》天道之精微，一則發明《中庸》誠意之思想，此亦蓋不出周子之意也。《御纂性理精義》卷一《太極圖說》亦說：“此即《西銘》之大指，然已具於周子圖像之中矣。”故此大義略示性理學發展之梗概耳。

洛學爲二程子所創之理學學派，然二程弟子及再傳弟子衆多，奈何《洛學傳授大義》獨及楊、呂、羅、李四先生？蓋此僅以朱熹所受理學之支流而言，故錄楊龜山、羅仲素、李延平三先生傳。而於《呂與叔先生傳》，唐文治則說：“呂與叔先生於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皆有說，經學最深。《克己》之銘，《心齋》之詩，啓迪後學尤切。而已發、未發之間，辨析精至，爲諸賢所不逮，故朱子於程門中特推與叔先生。文治獨其《禮說》，向所服膺，故著錄之。”（《洛學傳授大義自敍》）另及語錄、延平問答，而成一卷。然此大義僅爲一卷，又無錄文章，或如牟宗三先生在論及宋代理學諸家自成一派時所說，“當然二程門下還有很多人，但都是隸屬的，不是作主幹的”（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之第十八講《宋明儒學概述》）。認爲楊龜山、羅仲素、李延平諸先生於二程之學問，僅承師傳而已，未足以自成一派。鑒此，可以說《洛學傳授大義》中四先生自有其承先啟後之功，而不拘於篇幅之多少也。

程子之道，四傳而至朱子。而朱子集大成，致廣大，盡精微，綜羅百代。其平生所著書，一千餘卷。唐

文治自謂治朱子學五十餘年，“一時莫測其津崖”。《朱子大義》共八卷，較其他大義為最多。其中卷一朱子《行狀》、《壬午應詔封事》等，卷二《與陳待郎書》、《與留丞相書》、《答汪尚書》等多涉及政事，皆以講明大理，培植氣節為重。人生天地間，惟理不明，諸事無成，氣節風骨不修，亦不能浩然以自立。《壬午應詔封事》、《庚子應詔封事》等篇，浩然正大之氣無不溢於墨表。所言修政事，攘夷狄，絕和議，圖自強，風骨氣節屹然可見。而其《答胡廣仲》、《答張敬夫》、《答張欽夫論仁說》、《又論仁說》、《仁說》、《玉山講義》等篇，多言“仁”之精義，如“但仁乃愛之理，生之道，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，所以為學之要耳”（《答胡廣仲》）。言仁者，“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，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，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”（《仁說》）。又“若見得仁之所以愛，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，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，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”（《答張敬夫》）。其於“性”、“心”之論，如“須知心是身之主宰，而性是心之道理，乃無病耳”（《答姜叔權》）。亦可略見其端。而卷八《論孟集義》、《大學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諸書之序及諸記，亦多言及為學之大端、義理之大要。要之，此所選諸篇，多朱子發明先賢未發之意，以見其大成耳。

理者，千古不易者也。性理之學，不亦然乎！觀宋代理學諸大家，無不是聖賢豪傑，無不以修齊治平

爲己任，故唐文治之所輯述，亦爲聖賢之事業也。周子說：“聖人之道，仁義中正而已矣”，又說：“立人極焉”，張子說：“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”。確然乎有以立恒久之至道也。此書所錄周子、二程子、張子、楊子、朱子等人，及其著作，皆可爲後世之模範也。蓋此書一出，不惟於初習理學者有識門徑之助，蓋興廢繼絕，斯道之傳，實爲國家之慶，民族之幸也。

唐文治先生生逢亂世，經歷四朝，目睹世間變遷，雖顛沛流離，而有所樂者，何也？蓋樂其聚徒切磋，講明正學，救人心，拯民命也。其所樂者如此，而所憂者又未嘗不深也。所憂者何哉？戰亂不已，殺機盈溢，人命如芥，生理滅，而乾坤幾乎息矣。

前賢後賢，默契道妙，心憂天下則一也。周、程諸子莫不如是，故唐文治以憂患之心爲此書，蓋易見也。其說：“今世人心陷溺，殺機盈溢，奚啻戰國？非本人極之說以救之，則人道何由而明，人格亦何由而立哉？”（《周子大義》）故讀《性理學大義》者尤當留意於此也。

此次點校，一依原書風格。惟將各大義前之細目置於全書之前，正文加以標點，又略加分段以便省閱耳。

辛卯五月後學張家界符思毅謹識。

